

# 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圆桌·对话）第二期

## 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圆桌·对话）第二期

01:24正式开始

问：阿明先生：“四个自信”强调中国要继续深化开放资本账户开放，打造中国资本的世界性平台。一些人反对如此迅速地开放资本账户。您怎么看？

萨米尔·阿明：如果中国开放资本账户，那么温铁军提到的中国政府控制经济发展的能力将会完全消失，金融资产中国有银行控制的占比将从70%跌到5%，90%的金融资产将掌握在与国际资本勾结的私人资本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反动势力—美国和欧洲，都在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放开资本账户。

我在中国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是两篇很长的用英文写的文章，其中一篇是汇丰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发的文件，上面有汇丰的签名，另一篇的作者是中文名字，应该是个化名，这篇显然是出自中国中央银行，在开放人民币的问题上，汇丰银行当然提出了赞成的论点并且是非常愚蠢的论点，我说这些个观点都蠢得要命，但他们这样建议也不足为奇，汇丰银行是什么背景？它是英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勾结中国买办创建的银行，它的前身并不光彩，它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个，中国央行的文章中的回应则非常微妙，它并没有断然拒绝汇丰的提议，而是说这对当下和未来几年都并非是好主意，非常委婉地表达了拒绝，这显然不是中国左派的作风，如果是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他一定会实名反对，直接地提出反对意见，在中国这是可以被容忍的，但这篇文章来自中国央行，不想撕破脸，怕撕破脸，中国中央银行的官员没有直接发表伤害美国人的文章，而是用一种非常的方式写的，但明显表示反对，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无论你读到什么关于改革开放等等各种说法，现在(2015年)为止已经两年了，还没有真正落实为中国的国家政策。(汪晖：我希望他们在这一点上足够聪明)我认为他们很聪明，但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

05:55提问：如何区分左右

问：阿明先生：很多中国人都对左和右的区别充满混乱，您认为应该如何区分两者？

萨米尔·阿明：首先，我的分析是，目前全球面临着双重危机，这其中包括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这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的危机，我称之为普遍化的垄断资本，垄断企业对经济体系的集中和控制程度在上世纪70年代，也就是50年前，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系统已经陷入了危机，因为在此基础上，资本积累过程无法继续下去，除非垄断资本越来越多地对西方社会内部进行剥夺式积累，但是在全球范围内，他们对中国在内的边缘国家的剥夺会更加恶劣，但在另一方面，世界各地也都面临着大众阶级反抗这种不可接受的模式的危机，中国除外，因为它不是同一种模式，世界各处都会发生此类危机，原因在于上一次，即第一次尝试建构社会主义浪潮的合法性丧失了，无论是苏联式的还是毛主义的，因此这种双重危机的结果就是混乱。

# 全球面临的双重危机

一、资本主义的危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危机

加强对西方内部的掠夺

加强对边缘国家的掠夺

混乱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危机：  
反对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的危机

因此 这种双重危机的结果就是混乱

And therefore, out of that double crisis

从这种双重危机中，我们有机会为被剥削阶级和民族构建一个高效，可行的替代方案，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我们既要勾勒出社会主义的愿景，也要有应对当务之急的替代方案，中国面对的左右混乱，并不是无法忍受的混乱，正如你所说的那样，除非通过一些符号，否则人们看不出左派和右派的区别，那些说“我是毛主义者”的人好像就是左派，说“我是反毛主义者”的人大概就是右派，但这只是象征性的左右（指向汪晖：我稍后会再谈你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问题，为什么我认为它对于当代仍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左右混乱的情况更糟，因为混乱将以虚假的替代方案的形式出现，要么是法西斯主义的替代方案，比如在欧洲，特别是东欧，乌克兰等地，看到的正在抬头的法西斯主义，要么是在全球南方，出现的民族专政或伪宗教的形式，不仅是穆斯林政府，还有现在印度的印度教政府，还有所谓的达赖喇嘛藏人等等，这是帝国主义唯一能打出的牌，也就是通过这些人维持对南方国家最低限度的控制，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可能的盟友，在中东，我们看到了最引人注目的形式，那就是经济资助和军事支持那些恐怖分子，也就是那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这就是中国的不同之处，中国的混乱是量的差异，而不是质的差异，世界其他地方才是质的差异。

10:34问：新民主主义对当代意义

问：阿明先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于曾经的第三世界来说是非常有力的理论武器，它对于当代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吗？

萨米尔·阿明：我17岁时就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当然我那时是斯大林主义者，但是很快，五年后当我读到翻译成西方语言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时，我立刻成了毛主义者，并且现在仍是，为什么？因为我阅读这篇文章并反复品味，毛的论点是：中国已经开始了向作为更高文明阶段的共产主义的漫长过渡，这场漫长的历史过渡将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首先，他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是社会主义，而是用的“新民主主义”这个词，新民主主义指的是人民的政权，而人民的政权只能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逐

步发展，逐步接近社会主义，前提是，它是人民的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此处的差异是巨大的。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但同时，……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的。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毛泽东，1940，《新民主主义论》

## 前提是它是人民的民主

Provided that it is a popular democracy,

因为除了中国和越南，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政党都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就像蒋介石之前，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追求的那样，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赶超西方的计划，但是是试图通过与帝国主义谈判，从而拒绝帝国主义统治的，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毛主席指出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毛的主张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我最近在埃及用阿拉伯语出版了关键时期埃及共产党的文件，之后又出版了法语版，那个关键时期就是1955-1957年，也就是万隆之前，万隆时期和万隆之后的那段时期，也就是“让我们与旧制度决裂”的时代，让我们与买办和所谓的封建决裂的时代（其实用封建一词并不准确），同时我们要走向社会主义，当时论战的焦点是，纳赛尔走的是国民党的路线，他的计划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计划，纳赛尔的计划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因为埃及正在打破国际孤立的局势，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盟友，因此必须而且应该得到支持，这是正确的，但苏联为了使支持合法化，他们给纳赛尔政府贴上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奇怪标签，这在我们的共产党人队伍中引起了一场巨大而混乱的辩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支持，即使是批判性的支持，另一种是这样做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不应该把它当作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来打击，但是我們也不应该把它作为我们前进的道路，这场论战非常重要，而且是基于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解读，人民民主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这就是核心问题，这场论战仍在继续，这场论战在中国也仍在持续，有人赞成资本主义道路，即使他们仍然称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可能意识到了危险，并希望另一条发展道路可以继续下去，这双方仍然在争论不休，我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现了同样的争论，我去过很多地方，特别是西亚和非洲，不论在哪，在共产党人内部，在激进左派内部都存在这样的论战，这场论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说我有明确的答案，他们都错了，而是说它反映了一个

现存的真实矛盾，真实问题和真实挑战，且这一问题和挑战仍在继续，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论》仍然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要仔细阅读，参考文中提到的当时的中国历史，当时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国民党等等，但是如果更分析性地阅读它，我想我们就会找到答案，这就是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中苏关系破裂不仅是因为外交和对外事务，以及苏联干涉中国事务等等原因，还因为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17:38问：修正主义在当代的意义

问：如何看待伯恩斯坦、考茨基这些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在冷战之后的当代的意义？

萨米尔·阿明：说到修正主义者，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说是“修正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到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时用的是复数，而不是单数，这其中也包括第二国际，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马克思人已逝，但恩格斯当时前后奔走，即使他的学生考茨基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考茨基不仅选择了所谓社会民主改良主义路线，但更重要的是，他选择一条以欧洲为中心的亲帝国主义路线，世界其他地方都不重要，他认为，毕竟我们给那些野蛮人带来了文明。列宁在改良主义这一点上与考茨基决裂了，还有在国际主义的问题上，列宁认为这之中也包括了东方（现在我们用的词是“南方”），但他革命成功后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是农民革命的遗留问题，另一方面是西方持续的敌意或者说冷战，我认为冷战始于1917年，它从未停止过，而且还在继续，因为帝国主义不能容忍任何国家拒绝融入和依附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帝国主义不能接受这样的行为，他们甚至连今天（想融入西方）的资本主义俄国也不接受，俄国在某些方面与现在的中国非常相似，西方从未接纳过俄罗斯，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把它之为修正主义，我在一篇法语论文中分析了它，我说一方面是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斯大林，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我使用了修正主义这个词，是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历史的马克思主义，使苏联和中国正确地应对了农民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双重挑战，这两个国家的应对方案是不同的，不是因为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革命面对的客观情况的不同，俄国是一个半边缘国家，列宁当时面临着非常复杂的现实，俄国农民在十月革命前就夺取了土地，十月革命后继续夺取土地，他们想成为土地所有者，他们成了从所谓的封建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其实不应该叫封建地主而应该叫大地主），这给苏联带来了一个可怕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把多数想成为土地所有者的广大人口融入社会主义建设，我不会称他们为资本家，而是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者。

我认为毛泽东从中吸取了教训，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对这个问题的应对要好得多，中国的做法是虽然土地仍然是国家的财产，但可以由家庭来支配和使用，中国和苏联对外部威胁的应对各不相同，苏联被迫进行军事竞赛，这不是他们选择的，而是被迫的，我是说，如果斯大林没有决定以打破与农民的联盟为代价来加速工业化，苏联早就被纳粹摧毁了，战胜纳粹，90%要归功于斯大林和苏联军队，战后不久，因为杜鲁门无法发明任何对付社会主义的办法，丘吉尔为杜鲁门发明了新的冷战篇章，冷战又开始了，苏联被迫进行军事竞争，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要说的是，布兹加林刚刚非常清楚地提到，当时的苏联缺乏民主，缺乏真正的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军事竞赛的优先权有关。

由于地缘战略原因，中国有机会能够转变，因为当中国在1972年转变（逐步开始对美国开放）时，尼克松的访问，将竞争领域转移到了经济竞争领域，一个法国人写了一本很好的书，我推荐给中国人看一看叫《软冷战》，他认为(1972年)中美破冰并不意味着和平共处，这是战争，但是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就



解释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中国还尚能够保持这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倾向的混合政体，我也可以称它是修正主义，因为马克思的书里没有这些东西，那又怎样？马克思不是一个写下一切的先知，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研究他的著作，因为他是现代最强大的思想家，但也仅此而已。人们口中的修正主义总是带有贬义的，“你是个修正主义者，我可不是”，“我走的这条路才是对的，你走的那条路是错的”，但是如果摒弃这种论战式的用法，我们认为，与其把这些理论称为修正主义，不如说是为了应对人民所面临的现实挑战而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革新，这是积极的事情而不是消极的事情。我不知道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会怎么想，我不知道，也没人知道，但我想我对他的理解是，他会理解，因为马克思非常聪慧，马克思也曾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从一种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通的观点，转向了一种更加开放的观点，他关于俄罗斯公社所写的东西（指《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内容完全矛盾，我很能理解北京大学一位领导昨天发言时说的，“我现在对《共产党宣言》的强烈感受它是亲资本主义的”，《共产党宣言》或许可以被这样理解，但是晚期的马克思绝对不可以被这样解读，所以我认为那些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当然我指的不是那些反动的修正主义者，因为一直有右派修正主义和左派修正主义，右派修正主义想要倒退到马克思之前，左派修正主义是继续马克思的思想，但是是以一种创新的，自由的方式，你可以犯错，谁人无过，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毛主义和列宁主义一样，都可以被叫做修正主义，但他们是积极的修正主义，他们考虑到了现实的挑战，并在当时的情况下大致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 27:57问：国家与民族主义

问：法农和毛的著作中都强调了农民阶级和建立国家的重要性，但近些年也有批判民族主义的声音。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国家”？

萨米尔·阿明：首先，我非常喜欢法农，从一开始我和他就有私交，他是个极好的勇敢的试图保持清醒的人，其次，我想我告诉过他，尽管他不接受这点，我跟他说你个毛主义者但你不愿承认这一点，他确实是个毛主义者，因为他意识到了占大多数的农民的重要性，没有农民的参与，任何重要的革命都成不了事，他想到了所有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因为他本人虽来自于加勒比地区，但他属于非洲，而且他参与了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是整个非洲激进民族主义左翼阵线的建设者之一。我们有过一段共事的时光，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毛主义者，他认为革命就完全是农民的民族革命，我说如果你以这种方式看待革命，如果你把所谓的无产阶级或者说真正的无产阶级排除在外，排除普遍性的社会主义的视角，排除在地的重要的渐进改造的话，你就会走进一条死胡同，因为这种农民的民族革命最终会被地方资产阶级所俘获，这是我和他争论的观点。

关于国家的问题很复杂，实际上就欧洲而言，这就是马克思的经典分析，也是苏维埃马克思主义所采用的经典分析，而这并不是他们所特有的，因为资产阶级也是这样以为的：国家是在一定的疆域内由民族和市场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对欧洲来说确实如此，欧洲国家确实都是相对新近产生的国家，欧洲历史顶天了也就500来年，而咱们中国和埃及则是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这是其一，但这已被奉为教条，那就是除了资本主义一体化市场创造的国家之外，不存在其他国家，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早前就写到过，至少有几个十分古老的国家，包括中国越南可能算上朝鲜埃及，再多我也说不上，这并不是因为只有这些国家才有文明，就埃及而言，3000多年前，在基督诞生之前，我们就有国王了，就像今天的埃及一样，

是统一的，是同样的行政划分，各省之间的边界自5000年来一米都没改变过，首都的名字也和五千年前一样（只是在发音上做了阿拉伯化的改变但名字还是一样的），这些都是国家，我们都是国家，但是在其他地方，没有名称可以称呼他们，“部落”是错误的说法，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欧洲殖民者把1亿讲豪萨语的人称为部落，却把只有25万人口的冰岛称为国家，它是一个潜在的国家，但由于融入全球体系而停止了向国家发展的进程，所以，民族解放需要国家的视角来产生一个国家，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曾说（这句话没错，即使它是出自殖民者之口）：没有阿尔及利亚国，这里有的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事实如此，阿尔及利亚国是通过民族解放阵线和独立战争建立起来的，它虽然年轻，但它是一个国家，安哥拉曾经不算是一个国家，但它通过战争成为了一个国家，等等。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但意大利也是多语言国家，我是说，当你说乌克兰语和俄罗斯语不同时，乌克兰语跟俄罗斯语的关系可比威尼斯语跟西西里语的关系近多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包括最温和的，后来成为新殖民政权的那种，这些运动都与法农的观点相反，它们都得到了不同种族农民们的强力支持，从而建立了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资产阶级或国家买办资产阶级，阿拉伯语中专门有一个词描述这种情况，在其他语言中没有，字面意思翻译过来是“密友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意思是那些与国家政权关系密切的人的资本主义，不是通过企业的主动性而是通过利用政治力量，来获得成为资本家的可能性，非洲就是这样，但是它客观上创造了国家，帝国主义的整个战略就是要在种族或宗教的基础上再次摧毁这些国家，非洲有穆斯林有基督徒以及其他非洲当地信仰，在此基础上以什么为由头呢？以那种我讨厌的伪差异权，**人们应该拥有追求平等的权利而不是追求差异的权利**，民族解放运动建立在平等权力的基础上，尽管存在差异，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尊重差异，但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现在，平等的权利被替换成了差异的权利，这种对差异的是无止境的，长此以往中国将难以为继，我认为，这种对差异的强调是一种策略，非常不幸的是，全球尤其是西方的大部分公众舆论都接受了所谓的差异权。

出于心理原因法农不想成为毛泽东主义者，因为这与共产党的历史有关，法农对法国共产党的批评非常严厉，理由也很充分，但如果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他会说不，他们根子上都是一样的。

### 37:55您如何看待巴黎公社

问：您如何看待法国巴黎公社运动的意义？

**萨米尔·阿明**：我认为在近代有三次大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我所说的大革命，是指革命的目标远远超出了当时人民的直接需求和可能性**，法国大革命，追求自由 平等 博爱，自由与平等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联系，美国独立战争从未提到平等，他们说的是捍卫自由和财产，这意味着自由，不平等甚至维护奴隶制，毫无疑问，华盛顿总统就是一个奴隶主，比法国革命早一个世纪的英国革命，只是顺应新生的资本主义诉求而进行的一次小小的调整，根据其需要进行的调整，所以这不算是大革命，革命的目标是远大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以共产主义为名，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进行的革命，**共产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并不是当时中国和俄罗斯大多数人民的诉求，大多数人民的诉求是获得土地，获得尊重，是民族独立，但不是共产主义**，从这些意义上说它们是伟大的革命，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巴黎公社，因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是巴贝夫主义者，到了1795年，他们才自称为共产主义者，他们发明了这个词，因此，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尝试发生在法国不奇怪，因为巴

黎公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没有发生在英国，虽然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要先进得多，这就是我的评论，巴黎公社失败了，但正如我所说，我们可以说苏联的尝试，俄国革命现在也已经失败，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但中国革命没有失败，也没有胜利，它还在继续，这些都是大革命的现实。

#### 41:16对新的组织形式的看法

问：要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我们需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关系。我们是否需要、且能否创造一种不同于民族国家的组织？

萨米尔·阿明：在昨天，今天，明天国家仍将存在，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是这样，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已经组织了一套集中化的控制，并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攫取超额价值和价值，这是一个障碍，使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85%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无法实现赶超，因此有两种逻辑，一种是我们必须接受被垄断资本剥削，经济学家将这种现状合法化，他们说经济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我们只能在经济规则内运作，因此我们必须接受全球化，努力适应它，这是包括中国右翼在内的全世界右翼的观点。另一种逻辑认为，不，经济不是超自然力量，它是人类的创造，也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我们可以创造出另一个体系，来解决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我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做的是，除了要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基本分析，使各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在地统治之外，除了这些至关重要的事之外，还存在去依附问题，我称之为去依附，也就是说，我们不接受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的权力下放，也就是说我们要维护我们的“主权项目”，你们用这个词，我同意，中国依然拥有主项目，虽然中国存在各种问题，但至少还拥有主权项目，我们必须将主权项目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脱钩，正如我所说的，去依附不是一个公式或一个神奇的词，它是一个战略选择，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你要优先考虑本国内部的渐进的变革，并尽可能地让你的外部联系，包括经济关系，服从于实现内部变革的逻辑，迫使帝国主义适应你（而不是你去适应帝国主义的需求），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这就是万隆之后不结盟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所做的尝试和努力，这就是苏联，中国毛时期，甚至后毛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所做的努力，中国做得越来越少了，但是仍然还在做，但只是部分地，因为中国仍然还有自己的主权项目，这就是去依附。这和西方的“结构性调整”的概念正好相反，西方的结构性调整概念是根据中心国家资本积累的需要，对边缘地区的人民和国家进行结构性调整，也就是说，正如我曾以一种讽刺画方式所表达的，刚果必须根据美国的需要进行调整，而世界银行中没有人要求美国根据刚果的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一个基本概念，结构性调整最终就是变成种族主义，因为位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都是哪些国家？是北美西欧和中欧的白人，东欧已经是半殖民地了，但他们身处殖民地而不自知，中心也包括日本，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认为日本是名誉上的白人，中国人不是，你们不是白人，在种族隔离时期的日本人是。是不是白人与使用筷子与否，或所谓的肤色没多大关系，肤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肤色是次要的但仍然是个问题。所以我的回答就是，我们需要去依附，就中国而言，去依附不仅应该维护主权项目，而且应该不断加强主权项目。

#### 47:14全球金融化&中央地方矛盾

问：一、您如何看待金融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可逆的吗？

二、中央需要从地方政府上收权利，尤其是财政和税收权利。您如何看待愈演愈烈的央地矛盾？

**萨米尔·阿明：**你同时提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关于金融化的总趋势，另一个是关于税收制度，即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税收划分问题。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今天的金融化模式，因为金融化也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词，资本主义一直是金融化的，我们无法想象没有金融的资本主义，即没有货币、信贷，因此也没有银行业和金融化，我们也无法想象没有通过股票市场交易财产的资本主义，今天的金融化是危机累积的结果，是过度集中和攫取的结果，是攫取越来越大比例的附加值来为日益减少的少数寡头谋利的结果，正如我所说美国是寡头统治，欧洲也是寡头统治，不只是俄罗斯，基本上西方国家都是这样，日本也一直是寡头统治。所以，这种集中导致了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不断增长，但剩余不会被投资于扩大再生产，那么这些剩余流向哪里呢？两个方向，第一个是金融投机泡沫，一个接一个的泡沫，美国的次贷危机结束之后，就轮到了谷物石油等等，另一个方向是加速对南方国家和人民的掠夺，所有这些投机和掠夺也导致了生态灾难，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面，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它独有的一面，这是金融化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化是深层危机表现出来的症状。

另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内部的问题，我知道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13亿人口（2015），中国有的省份的体量都相当于一个国家，一个省的人口就有1亿之多，中国大城市人口超过100万500万的多如牛毛，因此像欧洲那样仅通过集中化的系统来管理公共财政的话，与中央财政相比，地方财政确实很少，因为每个省的体量都相当于一个小国家，但像你们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差异沿海和内陆的差异，北方农业贫困土地贫瘠，而中部和南部土地富饶，所以你必须对不同区域进行划分，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划分得对不对，我对中国还不够了解，但在我看来中国必须解决央地矛盾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给地方分配太多税收权，可能是西方战略的一种算计，这可能会增加独立倾向和地区分化的政治风险。

## 52:28戴锦华 总结

太大的问题，其实也是很直接和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道路，对中国现状和中国社会制度的判断，我想就是，既然在座的主要今天是跟同学们座谈，我就想强调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就是一方面，请大家意识到，现在很多旧有的概念都无效了，比如说左和右，比如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是当我们说它开始失效的时候，并不是意味着它不存在了，就是我们怎么能把握这个关系，那么这里面其实今天谈的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独立自主，脱钩，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实际上95年以来的中国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的斗争，当中包含了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自由派说新左派是国家的鹰爪，然后新左派说自由主义你们才是为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国家提供合法性，这个就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但是我觉得近年来更危险的是，这种论战的策略，把对方妖魔化的策略，实际上反过来又呼唤和构造了新的国家主义者，不同的思想脉络上的新的国家主义者，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谈话，四个主要发言人的谈话，其实在提醒我们注意，我们怎么能够，我其实特别希望你们能够保持在这种张力状态之下的思考，就是无所谓左右的，和更需要重新抉择我们的立场、位置和方向，我们置身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单元意义，民族国家的这个重要的单元意义，和不沦落为一个国家主义者（国际主义意义上），我觉得这个都非常真切，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财富是在于我们真实地经历过那段历史，所以我们自身携带着那个历史的矛盾和历史的记忆，可



能由于对于你们来说，你们不是内在于冷战的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我就特别希望你们能够时刻保持这种自觉，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观念，我经常跟温老师论战，但是我仍然觉得温老师其实他强调的那个东西，对我们的提示就在于此，所有的这些观念其实西来不过100年，我在这不是要说中国有泱泱五千年历史，我只是说，过去的100年的中国的历史，某种程度上是联系着那段历史，但是同时又是联系着一个新的全球化的历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观念的有效性和观念的无效性是我们特别警惕的，我另外想补充一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我们正在面对着一个实际上很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那么我们面对这个现实，我们要面对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失败的现实，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可能在历史中寻找，完全有效的，单一有效的，可以让我们面对现实的资源，包括毛泽东思想，包括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的思想资源，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凭空，没有这些马克思主义以来的多元的历史资源，去面对和回应今天的现实，我们这些人会走到一起，我们共同分享的东西就是这个张力状态，我们其实不是在强调中国的特异和中国经验，而是说通过中国的个案和中国经验，我们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们对于真实的历史处境，以及当时对于真实的历史处境和对这个历史处境的回应，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我们今天又面对着一个真实的历史处境，然后我们怎么回应它，齐泽克他说列宁主义的意义是，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创造出马克思主义，我也不去谈他对列宁主义的概括是否真切，但是恐怕我们每一个人，如我们自己想坚持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都意味着我们要“修正”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创造出，你在真实的历史重建当中去创造马克思主义，况且我们是外在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的历史，及其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大概就是这个。